

香港 | 传统又简约

文 | 程乃珊



▶ 程乃珊：海派作家。幼年在香港读书，成年后常往返于沪港两地，对香港感情深厚。

香港年假十分短，政府规定大年夜也照常上班，不过会早点（三四点）下班，到年初四就要正常上班。尽管如此，这一年一趟的大年，香港人绝对过得马马虎虎。

年前，银行会特设为顾客兑换新钞的服务。港人封“利是”重一个情，一般20元、50元一封，对象一般是门卫保安、亲友的小辈、常去的会所餐厅服务员及理发师等。封一张红杉鱼（百元港币）已是十分重的了，与内地人动辄千元的大手笔不能比。港人的年夜饭必须在家里吃，哪怕已独立搬出的子女，这顿年夜饭也必须赶回家去吃。传统年夜饭菜，必有烧肉一大块，通常去烧腊铺订购，还要有一煲汤，汤的内容丰俭由人，可以有海参、鲍鱼等。年夜饭前，全家要烧香祭先人。此外，大多数香港人都会在大门前供奉土地神，大年夜也要给土地祭酒上香，祈求新的一年家宅平安，然后年夜饭正式开席。

花市已成香港年景一大特色。港九各地都有此类花市，其中规模最大、人气最旺的是维多利亚公园内的花市。花市档位早就开始竞投，其中不少档位由在校学生竞投。学校和老师非但不会阻止，反而给予支持，认为可培养学生社会实践能力。有的学生会自行设计一些有创意的东西在摊档上卖，家长也不指望他们能赚多少钱，权当是学习。花市上的小食也极具香港特色，鸡蛋仔饼、鱼蛋串、烤鱿鱼，港人携大抱幼，穿着街坊装，边吃边逛，纯粹是个平民夜总会。花市到年三十凌晨四五点收市，明年再见。因此，年三十的花市都会有大折扣，档主将货尽力出空就收档了。花市因人旺财旺，所以港人都会在年三十全家去走一走，意蕴“行大运”。同时，也买回不少年花回去迎新年。一般做生意的喜欢买桃花和金橘，那种一人高的金橘，只只结得金光灿烂，是好兆头；居家的则置水仙、剑兰、银柳等。总之，花市上人人都抱一捧开得艳艳的鲜花，笑容可掬，显得十分有年气。

香港法律条文严格规定禁止放鞭炮，也不准放烟花，但不影响过年的气氛，街边屋廊常见有舞狮，还有搭台唱戏。以汪明荃、罗家英为代表的粤剧名角会搭出大戏棚，在新年期间出演吉祥热闹的粤剧。因有政府补贴，每张戏票仅售10元，届时戏棚内外人山人海。香港每周三、六有跑夜马，如若新年期间遇上跑马，那可真是锦上添花，特首也会来捧场。

香港上海人过年，自然又多了几分上海味道。上海人过年多讲究衣着打扮，这股风气自然带到香港。特别那些香港老上海，过年一定要穿中装，一般是极薄的衬绒及膝的旗袍，都是南下的老上海裁缝做的；然后是丝袜高跟鞋，老年女性就一双绣花鞋，外面再披一件紫貂大衣，所以香港时髦女性最盼过年来寒潮，如是，紫貂大衣就可以出笼了。此风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最盛行，近年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，特别年轻人讲求简约的生活，许多人认为那些中装一年就只有过年时穿一次，做工又贵，不划算也没必要。不过，香港老上海人还是守住这条底线，只是旗袍外还有中式套装，绣花短袄配同款的裤子，花团锦簇，十分有过年气氛，男士也不例外。特别大年初三，董事会、同年会或团拜会上，香港广东人也都是一律藏青缎面长衫加黑缎马褂，千层底布鞋，十分传统。

至今，香港老上海人过年遵循的还是上海传统，有些比上海还上海，比如过年点心为春卷、枣饼、宁波汤团、银耳甜羹等很上海的点心。上海人的新年茶，必配两个檀香橄榄，一个顶在茶盅盖上，一个放在茶盅碟边，俗称“元宝茶”。不少老上海家庭都会在中环的“上海总会”、“江浙同乡会”等老上海会所吃新年饭或年夜饭，饭后开出麻将台。一时吴侬软语，老派上海闲话时起时伏，真的有如时光倒流之感。

你总是想起她，点点滴滴，淡淡哀伤；你总是在守望她，故乡的消息穿过北方的冰冷、南方的潮湿，有时是一声春雷，有时是暮秋的一片晚霞。

归



焦雄屏：台湾著名电影学者、影评家、剧作家，策划出版了《电影馆》丛书等，监制作品有《香港情怀》、《望乡》、《洞》、《十七岁的单车》等。



台北 | 匆匆太匆匆

口述 | 焦雄屏 整理 | 唐骋华

记忆中，我小时候过年远比现在热闹。有几件事必不可少——几代人围一桌吃年夜饭，除夕夜放鞭炮，大人发红包，父亲用漂亮的毛笔字写春联，以及在长辈的带领下拜祖，给历代祖先的牌位磕头。当然，我们小孩子最盼望的永远是收红包。年初一大早，所有小孩一定全身上下从里到外都穿着新衣裤，连鞋袜都换过，然后兴奋地坐在家里面，等大人来发压岁钱。拿到压岁钱后，我们都会来一次小“赌博”，大人们则聚拢起来推牌九、打麻将。

长大些后，年初一我们不再傻乎乎地待家里，而会结伴出门游玩。雷打不动的固定节目是冲到戏院买票看电影，特别是《007》，总在年初一上映，不能错过。那天的票子照例最抢手，队伍看上去很短，却永远排不完，我曾经从白天8点钟排到晚上7点钟才进场。可是依旧很开心，因为那时过年，必定要看好莱坞大片的。

不过，随着父母长辈的相继老去，那种浓烈的氛围也渐渐消散。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拜祖，退出了大多数人家的春节习俗；即便有延续的，似乎也不如以往那般虔诚了。我印象最深的则是登门拜年的人。我父亲出生乡里，后来做大学教授，从前，每逢大年初一，哪一位乡亲、学生会来给父亲拜年、给我发红包，我都心里有数，是看惯了的。可岁月流逝，他们也在变老乃至故去，久而久之，熟悉的面孔日益寥落……

台北这座城市本身也发生着巨大变化。以前的台北，保持着乡里乡亲的亲密关系，有很多大家庭。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，台北慢慢向“都会化”发展，过年的风景也随之改变。平常，市区人特别多，拥挤、喧嚣、嘈杂，而一旦过年，异地人纷纷回老家，整座城市就迅速地冷清下来，计程车很好打、街道很干净，生活节奏则缓慢无比。同时，大家庭在现代化的冲击下瓦解了，取而代之以小家庭为主，昔日的习俗也就淡了。加上大众媒体发达，拜年发条短讯就好，不必登门造访。

于是，和我小时候忙碌、热闹的过年景象截然相反，今天的台北人趁这段时间，进行短暂的休息，享受难得的清闲。年轻人宅不住，就外出洗温泉或旅游——台北各大电视台的春节特别节目都傻傻的，千篇一律，好无聊，不像内地还有春晚的概念。另一个巨大变化是声音。由于台北市禁放大龙炮、甩炮，只能玩玩“仙女棒”，现在，除夕夜也听不到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了。

其实我自己很早就听不到鞭炮声了，因为鹿特丹电影节、柏林电影节在每年的一二月份开幕，我都必须参加。记不清有多少年，我未曾回家过春节。但在国外我们也有过年哦。在柏林，每年都会搞party，所有导演、演员、当地华人聚到一起吃饭，还给随行的小孩发红包。如果那一年代表众多或有重量级人物，那就会张灯结彩。我父亲刚过世的那个春节，我带了弟弟、妈妈去鹿特丹，邀请导演、朋友、影评人们共享年夜饭。那次许鞍华也来了，还收到我妈妈发的红包，好开心。

就我多年来的感观而言，似乎海外华人年味更浓一些。他们视此为“中国人的New Year”。去年的New Year，我是到洛杉矶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家里过的，气氛真好。在那里，大家自己买食材、做拿手菜，真是丰盛到不行。特别让我倍感亲切的，是亲友间的互相招呼、给小孩发压岁钱。朋友的爸爸也很有趣，是个老顽童，给我发红包。我忽然体悟到，老一辈传下来的过年习俗，实际上既是对人际关系的一种温习，也向下一代传递传统。

可惜，反倒是台北，近些年都市化速度太快，年味已经丧失了许多。这好像也不仅仅是一两座城的问题，我总有听到大陆的朋友说，那边春节的“年味”也越来越淡。我想，这些都是值得回味和思考的。我们是不是太匆忙了，丢掉了太多东西？所以，2012年的春节，我哪儿也没去，就留在台北和家人一起。